

网络文学:构建新的少数民族文化空间

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论坛在贵州举办

□本报记者 刘晓闻

7月25日,“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高层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此次论坛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主办,《小说评论》编辑部、《网络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绪晃、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葛建军,以及欧阳友权、李国平、欧阳文凤、邵燕君、庄庸、杪杪、周志雄、禹建湘、周兴杰、血红等近40位评论家、学者和网络作家参加论坛,共同梳理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现状,探讨其发展前景。

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网络文学精品,凸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亮点

陈崎嵘从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强调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他认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增进民族情感、沟通民族心理、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当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研究、评论和推介是薄弱环节,需大力加强。他提出,创作者和研究者应当遵循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和规律,既要寻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一般网络文学的共同点,更要提倡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特征、地域风俗风情的特殊性。少数民族网络作家应当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把握中华文化“一体多元”总格局,注重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俗中选取题材,凸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亮点,创作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网络文学精品。

欧阳友权对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他谈到,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已有蒙古族、藏族、土家族、苗族、侗族、彝族、保安族、回族、维吾尔族、壮族、布依族、满族、瑶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畲族、拉祜族、水族、撒拉族、裕固族、黎族、羌族、鄂温克族、京族等27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文学网站、文学频道或文学论坛,而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相关联的网站、频道、论坛有近100个。收录少数民族作家

作品的专业性文学网站也日益增多。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理论评论虽然不如创作繁荣,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他认为,发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就要在增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认同感、加强母语体验的基础上,弘扬民族精神,建立“多元一体”的网络文学发展观。这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生动现实,也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少数民族文学趋异与中华民族文学趋同之间形成一种文学张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要处理好“民族性”与“大众化”的关系

欧阳文凤已研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近20年。在他看来,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包括以1999年8月开通的“中国民族文学网”为标志的萌芽期,从2003年至2011年50多个少数民族文学网站、论坛陆续建立的发展期,2011年起至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开始向“类型化”转变的转型期。众多少数民族写手通过网络写作成为作家,例如瑶族的唐玉文,藏族的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扎西茨仁、巴桑、道吉交巴、王小忠、维子·苏努东主、白玛娜珍、扎西才让、旺秀才丹,回族的石彦伟,苗族的血红、虹玲、刘燕成、龙乌都巴,彝族的王国清、沙辉、余继聪等。一大批少数民族写作者将文学梦想植根于网络,用独特的笔触为本民族立言,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以强大的向心力构筑了少数民族新的精神家园。

杪杪以冉正万短篇小说《寒婆岭》中“高脚马”的隐喻为例,阐述了商业消费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衰变。他认为,在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由封闭走向开放。在描写新的生活秩序、呈现民族生活特质、咏叹传统衰变、扩大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影响等方面,网络文学提供着比传统文学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为少数民族写作处理“民族性”与“大众化”的关系提供了有利契机。一部分作者以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为基础,写出了反映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佳作,比如苗族网络作家西子的《蚩尤大帝》、白族农民网络作者宋炳龙的原创武侠小说《郁刀浪剑》等,走出了一条成

功的“民族文学大众化”之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本民族传统和文化生态的新变,在主题和价值观念的表达上不断探索新的路子,使“民族性”逐渐成为“大众化”的内容。

利用优秀网络文学作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会专家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发展充满信心。大家认为,尽管存在知名作家偏少、精品力作不多、理论批评滞后、发展模式不成熟等问题,但随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将成为坚守民族传统、反映民族生活、书写民族精神、呈现民族新变的重要载体,那些拥有民族生活经验、熟悉民族历史,又具有较高创作水平的网络作家的作品将会逐渐受到更广泛读者的关注。

周兴杰表示,网络空间不仅提供了“家园式”的、更具独立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空间,也提供了并不凸显少数民族特性的、普遍性的文学和文化空间。在“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的叙事和想象中,既有对本少数民族历史的重新追溯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再表达,也有用中华民族共有的神话、传说和文献等资源重构神话系统的努力。这表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庄庸提到,在当下网络文学发展越来越区域化的态势下,利用贵州丰厚和内生的地理文明和资源禀赋,有助于重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母题,为中国文学贡献“贵州模式”。

“悠久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为中国网络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养分,网络小说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讲述中国故事,满足广大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周志雄谈到,网络小说,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其想象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古今各种文学想象的当代变体,承载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时代特色,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积累了新的经验。

论坛期间,部分专家学者还围绕血红作品进行专题研讨。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族文学翻译

“一带一路”《民族文学》翻译培训班暨《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研讨会综述



近些年来,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民族文学》杂志社依托于6种文版,积极开展各类作家翻译家培训班,推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家、翻译家和作品。不久前,“一带一路”《民族文学》翻译培训班暨《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研讨会在京举行,60多位作家、翻译家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族文学翻译等主题展开热烈研讨。

与会者谈到,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让人们更加意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因此,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要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在这其中,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文学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践,从根本上体现在民心的相通,体现在沿线国家的获得感、认同感和参与度上。文学反映了各民族人民最深层的文化心理,是促进沟通交流的良好媒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翻译凸显出其重要性。这种交流,是文学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是人生体验的交流,是对事物感悟的交流,更是两个不同语境之间的内心独白交流。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通过文学翻译,有助于向世界读者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大家谈到,在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翻译工作,推进得越来越好。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推动下,把更多优秀的汉语作品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把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翻译为汉语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这都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共融共通、

繁荣发展。而在国际间的文学交流方面,“一带一路”战略为不同国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丰富的创作资源,有利于促进作家们在题材、主题、人物、民族文化等方面进行新的创造。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增强作品的国际视野。此外,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跨境语言,和周边国家的语言是共通的,这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便利。实际上,《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在创刊后,慢慢地辐射到周边国家,并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展示中国文学风采的一个窗口。

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民族地区文艺界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据介绍,内蒙古这几年连续在蒙古国举办“内蒙古文化周”,依托这一平台,国内文学作品被译成蒙古国文字,在蒙古国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学翻译家协会与蒙古国翻译协会也建立了合作关系,经常举办交流活动。而越来越多的翻译家也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将国内的优秀作品翻译出去,将国外的优秀作品翻译进来,国内出版的翻译作品越来越多样。比如,哈森翻译了《巴·拉哈巴苏荣诗选》《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等作品;照日格图翻译了《蒙古国文学经典·小说卷》;敖福全翻译了《蒙古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等。而这样的文学翻译实践,在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的翻译家中更是屡见不鲜。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推动民族文学翻译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大家谈到,通过文学翻译,目的不仅在于交流一本书、一首诗的艺术特色,而是通过这个媒介进行文化的交流。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翻译出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年代的风俗习

惯和文化心理。这对于翻译家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一些翻译作品,文字看上去都很顺,但就是缺少味道。这是因为翻译者缺乏对相关背景文化的深入理解,没有翻译出原作的神韵。鉴于此,青年翻译家们应该在文化积累上下功夫。

在选择翻译什么作品方面,翻译家也应该慎重一些。有与会者谈到,我们应该多翻译那些能够代表某一民族文学创作总体水平的好作品。现在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是朋友关系,或者是熟人邀请,或者是觉得翻译比较容易,就把一些不怎么样的文学作品随随便便翻译出去,并且在各个期刊上发表出来。如果有学者和评论家通过翻译作品来研究这一民族的作品,看到很多这样的“次品”,就会觉得这个民族的文学水准不行。而一般的读者也会产生同样的阅读感受。当然,也会有人说,先随便翻,翻译什么作品都行,译得多了好的作品就出来了。但在翻译资源有限的今天,应该首先聚焦于那些优秀的作家作品。翻译家应该思考,翻译这个作品对传播本民族文学、促进其他民族文学发展方面有何益处。应该让“翻译好作品”成为每一个翻译家共同的追求。

与会者还对翻译的艺术原则进行了探讨。大家谈到,文学翻译首先要忠实于原文。文学翻译要求翻译家具有作家那样的文学修养和表现力,以便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把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精妙地传达出来。有的译者对原语境条件下的作品没有完全理解或理解不深,却硬要翻译,结果总是不能够准确译出原作的意境。有的对原作大概了解一下,但并不拆卸,而是在脑子里留个大概的印象,然后在

新语境条件下按照自己的想当然,重新架构一个并不完全是原作结构的结构,这样的译作虽然有原作的大概影子,但事实上却成了译者的作品,如还原成原文,可能与原作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并不意味着译者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而是说,这种发挥必须以原作作为依托。现在在很多翻译家同时是作家,而且能够用双语写作,具有比较广阔的文化视野。少数民族作家的双语优势,不仅仅是多懂得一门语言那么简单,而是这种语言驾驭能力使得他们能够从比较的视野来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只有“知此知彼”,才能够比较和欣赏,才能够接受和发展,才能“美美与共,审美大同”。

文学翻译需要专心和耐心,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在翻译实践中达到“信、达、雅”的标准。有与会者谈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能够“为译而译”,只求速度不求质量,而应该继承老一辈翻译家那种为一个字一个词反复推敲的认真精神。但另一方面,在翻译中,翻译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精力,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回报。现在的翻译稿酬普遍较低,不能够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翻译的实践。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领域,很难通过译作畅销的途径来获得回报,那么获得较为合理的稿酬就变得相当重要。现在,党和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来扶持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人才,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新一代的翻译家都接受了较好的教育,随着他们的不断成长成熟,民族文学翻译事业也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华各民族文学会实现更紧密的交流,中国当代文学的风采会得到更好的传播。

(欣 闻)

20年前,三峡百万大移民在水面逐渐上升的长江边陆续进行,这道世界级难题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大部分移民就地搬迁,即从低处搬到高处,已是艰难,而另有十几万移民被安置到异地,更是极尽曲折。我出生于三峡的巴东,那里的乡亲有很多人因此从山地去到了江汉平原,荆门沙洋县一带便接纳了一批又一批三峡移民。拆掉了峡江的房屋,砍断自己栽种的柑桔树,抱着世代留下的族谱,携家带口含泪离开故土的山里人,一路风尘地来到那片陌生的土地,他们之中有我的亲友,还有一个叫王雄的18岁的年轻人。

时隔多年之后,王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移民乡亲们的感受写下了一篇篇文章,前年汇集成散文集《从峡江到平原》,眼下又有新作《在沙洋》即将出版。读到他的这些作品之后,感触尤深的是,这位亲历者以其质朴的写作,真实地记录了平原三峡村这一特殊村落的前世今生,再现了峡江人在命运更迭中的坚韧和追寻,同时也体现了以沙洋人为象征的开阔包容的平原精神,以及他们共同对家园的传承和再造。

王雄以真切自然的目光回望走过的路程。搬迁的那年,他刚从巴东乡镇的一所初中毕业不久,跟着堂兄学了两年关于不锈钢的手艺,装门窗,做扶梯,小小年纪四处奔波。他喜爱上网,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百里飘摇”。但手艺还没完全学到家,便遇到故乡的整体搬迁,王雄随父母由此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变动。从得知消息,到难以取舍,犹豫再三,五味杂陈,最终不得不舍小家、顾大家,离开世代居住的三峡。他在这样的经历中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2000年的春天,雨水下个不断,就像移民们难舍故土的眼泪,深深铭刻在他的心里。最初来到古老的荆门沙洋,面对一望无际的平原,相伴着长流不息的汉江、星星点点的湖泊,王雄与父老乡亲们无不感到陌生和迷茫。他们的安置房后面就是一大片芦苇地,在他们到来之前,真心欢迎他们的沙洋人用挖土机将那些芦苇连根拔起,而后平地建起了简易的红砖房,但住惯了三峡吊脚楼的土家人一开始实在是难以适应。平原上风声不断,一旦起风,安置房设在露天的灶台就遭了殃,落在锅里的沙比盐还多。平原上的雨水也大,带有淤泥的沙地一到下雨就变成一汪汪湖泊,山里人放在门前的拖鞋成了漂泊的小船,不知所往。移民们叫苦不迭:起风是沙,下雨是洋,难怪这地方叫沙洋呢。但面对种种不适应,峡江人没有退缩,他们以山里人的勤劳和执著坚持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在沙洋人的帮助下,经过几年的辛劳,他们得以搬进新建的一幢幢小楼,在广阔的江汉平原上,一排排白墙红瓦,不时闪现出“土家人”的字样,按照最初的心愿,他们给自己新的家园取名“三峡村”。

从王雄的作品里,读者可以得知一个个峡江人是如何渐渐融入沙洋,成为平原人的故事。峡江人在山地种的是玉米红薯,平原种的却是水稻和棉花,跟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山里人一筹莫展,是当地的农业技术员手把手地给他们讲授如何种水稻、如何培棉花。村民们从抵触到渐渐着迷,以至后来种的水稻、棉花亩产超过了当地人,这其间有过多少烦恼,又收获了多少喜悦啊。原来在三峡的交通主要靠步行,背着背篋翻山越岭,而到了平原,大家出行主要是骑自行车,而运输则用三轮车。是周围热情的沙洋人教会了峡江人骑自行车、驾驶三轮车,从歪歪扭扭到掌握平衡,一来二去,峡江人与沙洋人成为了好朋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三峡村的青年男女开始悄悄地和平原人恋爱,他们用不同的方言使劲地走向对方的心灵。他们结婚、生子,孩子成为新一代平原三峡村民,会说峡江话、沙洋话和普通话,自如地生活在这个仍带着浓郁土家特色的村庄里。

当年移民中那个年龄最小的女孩未曾满月,如今已就读于沙洋高中,如花蕾般绽放,已懂得逢到下雨变天时,给腰酸背痛的妈妈冲一杯糖茶,漂亮开朗的姑娘和当地学生的口音、生活习惯已无二致,快乐地生活在这个平原家园里。曾任三峡村支部书记的周辉刚,未搬迁前是一位建筑工,来到沙洋之后,他每天骑着单车穿行于一些大小建筑工地找活干,开始只能接上一些小活,渐渐以三峡人的吃苦耐劳、做事认真得到了当地建筑行业的认可。他所带领的移民建筑队注册了建筑装修公司,添置了机械设备,经营项目不断扩大,他连续几年被评为荆门市优秀企业经理,被推选为沙洋县第四届政协委员。

平原三峡村就是这样一个个移民的变迁中走到今天,就像一幅图画,人们可以看到沿着长长的公路,三峡村的几百户人家相对而立,门前的花坛与果树连接了一条绿化长廊;村庄中心是土家族风格的吊脚楼,铺设着将人们的念想引往鄂西的琉璃吊檐和脊饰,指示牌上写着“三峡村”。2012年,三峡村实现了土地部分流转,架起146个蔬菜大棚,发展了土家族农家乐餐饮,卫生室、超市、农家书屋一应俱全。村里还组建了一支具有民族特色的“土家族艺术团”,自编自导的节目《巴山汉水儿女情》《父亲》《六口茶》等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每当夜幕降临,村民们会来到村头围跳广场舞,他们跳的是跟沙洋人不一样的土家摆手舞,那些古老的峡江歌谣被他们带到了平原,也成了当地人哼唱的歌儿。

这是平原上的新三峡。从王雄的笔下,我们得以触摸到移民故事所散发出的人世间最为朴素又最为贴心的温暖,感受到平凡人生的善良、真诚与美好,感受到峡江人与平原人的不同性格以及最终不断走向融合的时代历程。

王雄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养活妻儿,与乡亲们一起共建家园,并以写作打造一个寄予理想的精神家园。他将峡江人善于感恩的品德带入所经历的情景之中,从最初结识荆门作家李诗德,读到 he 邮寄来的诗集《水垭头》,受其影响而开始写作,后来得到《沙洋文艺》主编金成海、《荆门晚报》编辑黄旭升等人的不断鼓励,他将生活的磨砺与人们的激励一一铭记在心,化为写作的动力。作为举世瞩目的三峡移民工程的一位亲历者,王雄的非虚构写作,与旁观者的写作相比,显得尤为真切。他的新作《在沙洋》更为开阖地表现了他与乡亲们在平原上的人生经历,也表达了他不断超越自我、为平原三峡村代言的精神追求。他在散文《从屋后到房前》中写到岳父修房时他移栽一棵朴树的经历。他信心十足,意识到如何面对“挪动”的挑战,不仅是自己对象故土的相思做一次“归根”的处理,更是重新认识自我、面对新的生活及未来的梦想的机会。王雄同他心爱的村庄一道,在不断走向美好,近年来,他不仅安居乐业,写作也不断获得认可。他的成长与写作伴随着平原三峡村的变化,注定与他的乡亲们各自经历的故事一道,载入这个屹立于古老平原之上的特殊村庄不断创造的历史。



■新视野

平原三峡村的真实记录

□叶梅